

刘少奇 被囚开封的最后日子

李用胡，湖北第二电机厂退休干部，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回国后，他历任驻河南某预备师某部排长、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副队长、队长、指导员等职，1978年转业回到湖北咸宁老家。

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期间，李用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主席。谈及这段往事，如今已步履蹒跚的李用胡老人一脸无奈，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人知的心酸故事。

执行“紧急任务”，心酸涌上心头

1968年底，我从北京举行的大使馆警卫培训班结业，回到了开封驻地，担任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，从事政治宣传教育工作。

1969年10月17日下午，我们接到一项任务：有一位受中央“重点审查的对象”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，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、看守工作。命令来得很急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“重点审查对象”究竟是谁，只是隐隐地觉得，这个人可能不一般。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，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。

那天晚上，天气有点冷，风也很凉。大约晚上9时30分左右，一架伊尔-14型飞机悄然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。早已等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，进入飞机，来到机舱后部。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，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、瘦骨嶙峋的老人。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，喉咙里塞着吸痰器，胳膊上扎着输液管，瘦弱的脸十分苍白，没有一丝血色。

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架抬下飞机，这时我借着月光，仔细看了看担架上的老人。看着看着，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里见过，我猛地发现：这不是我们的国家主席——刘少奇吗？我怔住了，所有接受“任务”的人也都被怔住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，大家只是用质疑的眼神看着眼前的老人。当时，我们知道刘少奇主席已经被打倒，但是我们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一阵心酸涌上每个人的心头。

很快，担架被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。北京来的3位医生、护士和刘少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同我们一起上了救护车，在漆黑的夜路上，救护车向市区急驶而去。

戒备森严，我们也失去了“自由”

救护车越过南土街，驶进了开封市“革命委员会”机关一号楼的小天井院。小院僻静而阴森，与外面完全隔绝。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。当时，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外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



刘少奇与妻子、女儿的合影

从这天夜里开始，小院内外“如临大敌”、戒备森严。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，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，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。大门口有岗楼，门外有哨兵，屋内有警卫。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，被称为“17号任务”（因为刘少奇是10月17日到开封的）。那时，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“自由”——不准外出，不准写信，不准同家人、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，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、生命作了保证。

那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“监狱”里从事看守工作。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的卧室门口，布置了两道警戒线，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，警卫方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。第一天晚上，我便参与了看护。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，刘少奇主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他扫视了一下四周，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。他可能不知道，这就是他11年前兴致勃勃视察过的古城开封。然而，这次重来开封，已是物是人非。刘少奇主席看了一下周围，什么也没说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病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力气思考。

北京方面的人全部撤回，我们完全接替监护

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窗户上没有玻璃，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他虚弱的身体上。在到开封的当天夜里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，高烧达到摄氏39度，呕吐得很厉害。而林彪在河南的伙计汇报称：“一切均好，病情无异常变化。”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，可得到的指令却是：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；河南准备的药要退回一部分；禁止到外边购买药品。这样一来，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就完全失去了作用，更谈不上治疗。

直到11月5日，刘少奇再次发高烧，整整抢救了两天，体温才降到摄氏37.2度。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，虽然他不说话，但神志还有点清醒，特别配合治疗，看来他要坚持下去，想活下去……

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，也就是11月6日，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，一个也不准

留。从这以后，刘少奇的监护、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。尽管都接受了“仇恨”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，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，眼前的所见所闻，同报纸上所谓“最阴险、最凶恶、最狡猾、最歹毒的阶级敌人”的说法反差太大，怎么都对不上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，病得奄奄一息，靠鼻饲维持生命，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，牙齿只剩下七个，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。

偷偷抹去泪水，我们为他盖上一块白床单

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、渐渐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，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、护理下，病情进一步恶化。当时，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更不知道自己的妻子、儿女眼下身在何方，遭遇怎样，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。我们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见一面的想法，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能力做主。

11月10日晚，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，体温一再攀升。但当时的条件和医护人员的医疗水平有限，又不熟悉病史，只得按肺炎治疗。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，到深夜时，刘少奇的嘴唇发紫，吸氧也不见改变，瞳孔对光的反应消失，体温达到了摄氏40.1度。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，到第二天早晨6时40分，发觉情况不妙，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，然而为时已晚。6时42



1969年，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病逝，终年71岁



王光美在迎接刘少奇骨灰的专机上，神情哀伤

分，医护人员到齐，3分钟后，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，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，停止了跳动。

在刘少奇临终前，我发现在他手里有个硬塑料瓶，已经被他攥成了小葫芦形状。我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水，给我们共和国主席——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了一块白床单。

火化“烈性传染病病人”，我们戒严现场

刘少奇临终前，身边没有亲人。他的妻子、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。直到林彪逃亡后的1972年，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早在3年前就离开了人世。

刘少奇主席去世后，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。由于地下室很小，屋长不够他的身长，只好把停放遗体的担架斜摆着。

刘少奇主席的老卫士长李太和接到刘少奇死讯的电话后，匆匆赶往机场，飞到开封，直奔地下室。盖着白床单的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，嘴和鼻子已经变形，下颌有一片淤血，如雪的白发蓬着，足有一尺多长。李太和悲痛万分，他含着泪细细地给老首长修剪长长的白发，轻轻地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，用一套普通的衣服作为寿衣，裹住刘少奇骨瘦如柴的身体。

15日深夜12时，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。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，他的小腿和脚都露在车窗外。此时，火葬场早已接到通知，说有一名“烈性传染病病人”要在今晚火化，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。

“灵车”慢慢行走在古城的街道上，没有一个花圈，没有一朵白花，有的是漆黑的夜幕与那滴滴嗒嗒的秋雨。我们组织20多人把小小的火葬场戒严起来。按规定，在死亡登记表上要注明具体病因，可是那天，上面只填了“传染病”3个字。老司炉工不解地问：“到底是哪种传染病？”有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催他快点火化。

没有任何仪式，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，一位国家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消失了。没有哀乐，没有哭声，没有鲜花，没有党旗，火化结束了。与此同时，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，也被付之一炬。剩下的，只有一张“骨灰寄存证”，上面填写着：姓名：刘卫黄；职业：无业。并有人冒充刘少奇的儿子“刘源”，签名办理了寄存手续。

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市火葬场骨灰存放室。随后，“专案组”宣布纪律，要我们谁也不准透露出去。

历史自有公论。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了14年后，终于昭雪了。1980年2月，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四年，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，恢复名誉。五中全会公报广播的那一天，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（据《党史纵横》）

小说连载 >>>



Q个姐姐当太太

事到如今，他才知道年龄不饶人。可是，这种事能向谁说呢？童晓菲的脾气开始大起来，起初是在人后，跟孙庆国闹闹小别扭，后来耍脾气时间长了，人前也习惯了，当着外人的面，也敢跟孙庆国叫板。孙庆国心里清楚，也不跟她一般见识。他更明白今天争吵的导火线，明里虽然不是童晓菲“得不到”，但潜意识里，他知道这里面的缘由，所以他在争吵过后，就不再吭声了。

午餐时，公司租用的大楼物业管理处送来午餐，这是上班时众人提前点好的食谱。年轻人都聚在一堆吃，你抢我一勺子肉，我夹你一筷子菜，吃得跟玩儿似的，快快乐乐，让孙庆国看了很羡慕，过去他跟童晓菲有时也跟大家伙儿凑在一起吃，今天却因为刚才的争吵，所以两人把饭菜集中在办公室吃，其实也是想借此和解一下。

夫妻俩先是各吃各的，没说什么，其实心里还在揪着那个疙瘩，后来还是孙庆国先打开话题：“晓菲，今儿个的话，可有点过了，我们以后不再这样吵了，好不好？”

童晓菲也自知理亏，可她就是不认错：“我就不改，我就不改，你还能怎么样？把我吃了？”

孙庆国笑了，他知道小妻子的脾气，撒娇撒惯了，死不认错。他无奈地说：“我让着你。”

童晓菲也笑了：“就是嘛，谁让你是老爸呢！”这是只有他们夫妻才听得懂的情话，因为孙庆国的年龄在那里摆着，所以每当夫妻俩“做那事儿”时，童晓菲总要亲昵地叫孙庆国“老爸”，这种娇嗔把孙庆国叫得心花怒放，每每这时，总是全力以赴，尽职尽责。童晓菲叫他老爸，让他有一种乱伦的错觉，这种犯罪似的快感，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形容出来。

现在童晓菲这么一叫，孙庆国一点脾气也没有了，小妻子的一句话，化解了一切可能喷发的火焰，这让孙庆国越来越知道童晓菲是水做的。

过了几天，大家差不多把这事儿忘了的时候，刘建豪拿着一张发票走进孙庆国的办公室：“孙总，这是昨天去科技市场参加展览的展台费，我们的展台被评为一等奖，电视台也来录了像。”其实他更想表明的是广告词是个亮点。

孙庆国当然明白，作为老总，他知道应该给予下属的鼓励，所以也就顺势道：“还是你的广告词比较吸引人吧。做得不错，继续努力啊！下午是谁去值班的？”

刘建豪开心地笑道：“我会努力做得更好。下午是童总带队，我和郭水萍值班。”

孙庆国在发票上签了字，嘱咐道：“给大家说说，值班费我会考虑再给加一点，另外值班的盒饭也别太将就了，给大家买点像样的。”

傍晚的盒饭，加了新料。炖得很烂的鸡块、炸得焦黄的鱼排、还有一些可口的素菜，满满盛了一盒，然后是一盒米饭，大家吃得很有兴致，虽说盒饭不算大餐，但老板如此宽厚，体现了一种风度，于是郭水萍边吃边说：“嗯，老板万岁！”

刘建豪觉得受了点刺激，一餐盒饭就能让你喊万岁？他不由得说：“郭水萍，等我有钱了，也开一家公司，聘你来当业务经理，天天管你吃盒饭，但你要保证天天喊我万岁。”

郭水萍比刘建豪小4岁，但她却早到公司几个星期，对刘建豪的到来，她早早地暗暗在心里打了分数，此时她笑道：“好呀，我这人好说话，谁聘我都行，谁的工资高，我就跟谁走！”

刘建豪说：“你这是有奶便是娘吗？”

郭水萍说：“无奶的是爹。”

来参观的人离开后，三个人闲坐着无事，童晓菲提议：“我们讲点笑话开心吧。刘建豪，你有吗？”

刘建豪说：“要说笑话，我平时也听过好多，可就是一让讲的时候，就想不出来了，我说个我们在大学军训时发生的真实故事吧。那时大家训练几天，个个累得要死，晚上倒在床上，歪头就睡，可能因为太累了，有些同学就开始讲梦话，那梦话真笑死人。我有个同学几乎每天都说梦话，最傻的一句是：‘老婆，我不敢了……’让我们这些没睡着的把他笑醒了，从此给他取外号叫‘不敢了’！”